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栏

党领导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程与经验

庄尚文,王 庚

(南京审计大学 经济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5)

[摘要]党领导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致经历了奠基与铺垫、探索与启动、确立与发展、深化与完善四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理论上的认识与突破也有所不同,从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手段,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体现了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理论认识不断深化。回顾这一光辉历史并得出的基本经验是: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推进解放思想,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坚持步步为营,实施渐进式改革;善于重点突破,策略性化解重大结构性矛盾;注重激励约束,促进地方政府合理有序竞争;以人民为中心,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关键词]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源配置;共同富裕

[中图分类号]F12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4833(2022)02-0001-06

一、引言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生产力的进步是幸福和复兴的前提,社会主义不能在生产力方面比资本主义落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历史性飞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其成功的关键是党领导建立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机制两个方面的优势。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我们党不仅在制度层面进行顶层设计,还在理论层面不断创新,建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更好结合的基础与保障^[1]。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发展阶段,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实践再次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党通过不断完善体制机制,极大地调动了市场经济主体的积极性。2020年中国经济实现了2.3%的正增长,再次创造了奇迹。

本文回顾了党领导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程,总结了基本经验,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解,为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二、党领导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程

(一) 奠基与铺垫阶段:1949—1977年

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解放战争的全国胜利,建立了新中国。1949—1952年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53年,我国开始实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并提出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到1956年底,我国基本完成了“三大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同年,党的八大召开,会议提出:党和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努力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先进的工业国。从这时起,我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阶段。

在随后二十年中,虽然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了一些挫折,但我国仍然取得了巨大成就,建立起了相对独立且完整的工业体系。我们党积累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形成了一些十分重要的认识:走自己的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要尊重价值法

[收稿日期]2021-11-21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2020SJJZDA051);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十四五”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规划课题(YB131);南京审计大学高教研究重点项目(2020JG001)

[作者简介]庄尚文(1982—),江苏泗洪人,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从事经济监督与市场治理研究;王庚(1989—),江苏宿迁人,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博士,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E-mail:270364@nau.edu.cn,通讯作者。

则,大力发展商品生产^[2]。这些历史成就和理论认识,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理论创新并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基础。

(二)探索与启动阶段:1978—1991年

1.改革目标与效果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探索的开端,在这次会议上,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同时重新肯定了价值规律的重要作用^[3]。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4],1982年党的十二大为中国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5]。此后,关于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大讨论催生了经济体制改革新变局。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属性^[6]。1987年,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模式^[7]。

可见,这一阶段主要是通过拨乱反正,日益重视市场调节的作用,探索和启动经济体制改革。改革促使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镇化不断推进,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2.理论认识与突破

这一阶段的理论认识与突破主要是正确认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资源配置方式的不同),重视市场调节的作用,注重市场主体培育。

其一,计划与市场都是资源配置方式。在这一阶段,经过艰难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检验,对于经济体制的政策表述实现了步步为营的渐进式突破。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不仅在事实上界定了一个允许市场调节存在的经济体制,而且完成了计划与市场主辅关系的转换。这一理论认识上的巨大跨越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

其二,重视市场调节的作用。发展商品经济自然要重视价格机制的调节作用,价格机制改革由此成为这一阶段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在这一阶段,大部分农产品价格和消费品价格得以放开,工业生产资料则实行价格“双轨制”,即对计划内产品实行国家定价,对计划外产品实行国家指导价和市场定价。同时,计划被划分为“指令性”和“指导性”两类^[8]。这一系列改革措施充分体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要求的“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

其三,注重市场主体培育。发展商品经济的关键是培育市场主体,这就需要重点关注企业机制的改革,赋予企业积极性,即“放权让利”。从1978年起,在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上实行“简政放权”和“减税让利”,先后推出企业基金制、利润留成制、第一步利改税、第二步利改税、各种形式的盈亏包干制和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等,这一系列措施对于冲破旧体制的束缚和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但随着“放权让利”的推进,其弊端也开始显现,迫切需要建立有效运行的新经济体制^[9]。

(三)确立与发展阶段:1992—2012年

1.改革目标与效果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层面科学界定了社会主义的本质^[10],党的十四大和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实施框架^[11]。1997年,党的十五大评价“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一个伟大创举”^[12]。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我国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部署。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13]。可见,这一阶段主要是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改革呈现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特征,搭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的贡献。在加入WTO以后,我国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开放格局,拓宽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国际视野。

2.理论认识与突破

这一阶段的理论突破主要是论证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可以结合,明确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深化了对国有经济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其一,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可以结合。早在1979年11月,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14]1990年12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又强调:“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计划和市场都得要。”^[10]为此,江泽民评价“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11]。

其二,非公有制经济是重要组成部分。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随后又提

出“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抑弊,逐步引导”的十六字方针,但由于后续“价格闯关”失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受到了影响。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提出用“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对于非公有制的认识才开始全面转变。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2]。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两个毫不动摇”^[15],将非公有制与公有制一视同仁,进一步推动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

其三,重视发挥国有经济的优势。在前一阶段以“放权让利”为主线的改革中,国有企业开启了政企分开、自主经营的改革历程。但由于彼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确立,国有企业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16]。到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国有经济的重要性,也为国企改革指明了方向。1995年6月,江泽民在长春召开的企业座谈会上将国有企业和国企改革的重要性提升到了新的高度^[17]。

(四)新时代深化与完善阶段:2013年至今

1.改革目标与效果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也上升到了新的高度。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20年,中央出台文件,明确要求“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一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科学谋划和顶层设计,加强了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统筹推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加快完善,并将其上升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市场体系进一步扩展,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绝对贫困历史性消除。

2.理论认识与突破

这一阶段的经济理论突破主要是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党进一步深化认识了市场和政府各自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并提出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方略。

其一,明确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经过20多年的实践,我国的市场化程度大幅度提高,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实践的发展推动了认识的深化,随着我们党对市场规律的认识和驾驭能力的不断提高,将市场机制的作用定位成“决定性作用”具备了理论前提和实践基础。其二,进一步认识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党的十四大、党的十五大、党的十六大、党的十七大到党的十八大,我们党日益关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是要更多发挥政府作用,而是要在保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管好那些市场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18]其三,提出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方略。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总要求,就是从更高起点、更高层次和更高目标出发,构建更加系统完备和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促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三、党领导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验

(一)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18]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离开了党的领导,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创新理论的诞生,不会有充满活力、焕然一新的经济面貌,更不会有中国的“增长奇迹”。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完成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并尽快富裕起来的主要任务,我们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从体制机制层面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和实践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与体系完善。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处于领导地位,并发挥着积极推动作用。

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主要体现为不断长期化、制度化的经济工作领导体制机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形成了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机制体系。其中,党代会主要制定经济社会发展的总纲领,并对前期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从党的决议角度给予确认并提炼为党的理论;党的中央全会主要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事项;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主要总结当年经济工作成绩,分析研判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提出下一年要抓好的

重点任务。依托制度化的经济工作领导机制体系,党实现了对改革经验的及时总结以及下一步改革目标、发展战略和实施路径的谋划和部署,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和发展。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党领导各项事业的具体制度,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各方面。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统领性原则和根本政治保证。随着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进一步制度化、科学化,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作用和对经济建设的推动力将进一步彰显。

(二)推进解放思想,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

改革需要在观念层面达成共识,也需要从观念层面突破旧体制的束缚。改革启动前,首先要解放思想;在改革推进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党领导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计划到市场,是一个解放思想的过程。

在我国,破除对市场经济的教条认识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过程: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一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并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中,提出了“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著名论断,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做了思想上的铺垫^[14];改革过程中,邓小平又多次强调,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打破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从根本上对立的传统观念;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用“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突破了“姓社姓资”的改革瓶颈。思想解放的大潮促进了大改革大开放,它最终促使我国经济体制发生了历史性转变。

党领导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程,启迪我们要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实践。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10]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通过后,邓小平评价说“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10]。此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们党形成了许多重要理论成果,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总结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回答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前人从未遇到过、西方经济理论始终无法解决的许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系统提出了中国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阶段如何发展的方略,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创新^[19]。正是这些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理论创新和思想指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不断得到完善,中国经济才行稳致远。

(三)坚持步步为营,实施渐进式改革

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转轨,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但与“苏东国家”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激进做法不同,中国选择了渐进式的改革道路,在持续的探索实践中将改革不断推向深入。这种步步为营的渐进式改革策略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内在要求,对于在改革进程中实现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安定团结起到了重要作用。

市场化改革中的渐进策略集中体现为对市场机制定位的逐步调整和突破,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动体现了我们党是在理论和政策不断得到实践检验的基础上,稳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在这一渐进式改革的进程中,对市场主体的培育颇具代表性:改革初期,我们党将改革重点放在培育非国有经济的市场主体上;随着非国有经济的逐渐壮大,竞争压力倒逼国有经济改革,确立了“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改革方向,国有企业最终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合格的市场主体。这种温和、渐进的改革避免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剧烈冲突^[20]。当然,改革过程中也遇到过像“价格闯关”失败那样的挫折。这一反面经验也提醒我们,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的市场机制的建立完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只有主客观条件都具备,改革措施才能顺利推出和实施。

对于改革的节奏步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阶段推进改革,必须识得水性、把握大局、稳中求进。”^[21]2017年1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战略上要坚持稳中求进,……战术上要抓落实干实事,注重实效,步步为营,一仗接着一仗打。”^[22]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重要论述,折射出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新境界。

(四)善于重点突破,策略性化解重大结构性矛盾

事物是运动的,矛盾是发展的,社会的主要矛盾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和完善过程中,善于抓住主要矛盾,根据经济社会的突出问题进行重点突破,是我们党推进改革的重要法宝之一。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党果断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20世纪80年代末,面对“价格闯关”失败的挫折以及一些人提出的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世纪90年代,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党中央、国务院高瞻远瞩,作出了加入WTO的重大战略决策,并经过15年的艰苦谈判完成入世,我国由此开始了更深层次、更宽领域的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面对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的严重困难,我们党坚定推进国有企业脱困改革,在付出一定代价的同时,实现了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的宏大改革目标。此外,我们党还领导人民成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等经济风险,彰显了党抵御风险和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

近年来,我国经济在供给方面存在明显的结构性矛盾,供给质量不高,制约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此,中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可以理解为通过政府政策的有效供给,在政策的优化设计与切实执行方面规范和约束国有企业的投资决策,引导和鼓励民间投资活动,调整经济中的供给结构,扩大中高端供给,适应社会主导性偏好的变化,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

(五)注重激励约束,促进地方政府合理有序竞争

在党领导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广义)通过放权让利来调动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到开发区建设、招商引资如火如荼,充分反映了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在制度层面,从“财政包干”到“分税制改革”“锦标赛竞争”,再到高质量发展目标的确立与考核,体现了中央从竞争性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层面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我们也应注意到,地方政府及官员的约束条件和行为选择会对公共政策效果产生影响。在追求以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为主要目标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地方政府公共支出中关系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教育、医疗支出比重不足,存在过度经营土地和城市的问题;地方政府也存在一定的政企合谋与权力寻租现象,导致出现生产技术的低成本、高污染等选择性偏向问题,进而出现损害自然资源与环境等影响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问题,甚至部分地区出现了损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问题。

为此,党中央提出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尤其是国家审计通过对国有资产、公共资金、公共资源以及领导干部经济责任的监督全覆盖,全面评估各级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的合规性、效率性与效果性,为完善官员激励约束机制、促进地方有序竞争以及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不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制度保障,还是推动中央重大政策贯彻落实、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制度基础。

(六)以人民为中心,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并指出所有人的富裕是未来生产的目的。在经济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坚持一切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关于共同富裕,1992年邓小平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23]在世纪之交,江泽民在总体小康已经实现的背景下提出:“制定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基本着眼点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17]胡锦涛强调:“在促进发展的同时,……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24]

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我们党不断推进分配制度改革,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组织实施了脱贫攻坚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7.7亿人脱贫,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2021年,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这些伟大成就的取得,与我们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价值取向的发展思想是分不开的。

四、结语

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人类历史上是首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完善,极大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这种成功探索充满艰辛,更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成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它的完善和发展对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我们必须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坚定不移深化市场化改革,推动形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回顾党领导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程并总结经验,既是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也是为了学懂弄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系列创新理论。在新发展阶段,作为高校教学科研人员,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理论研究,久久为功,以实际行动践行新发展理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上建功立业。

参考文献:

- [1]朱安东,孙洁民.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探[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0(5):98-103.
- [2]中国共产党简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216.
- [3]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7.
- [4]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N].人民日报,1981-7-1(1).
- [5]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8-29.
- [6]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568.
- [7]黄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三种具体模式[J].财经科学,1988(5):4.
- [8]杨新铭.党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程、经验及支撑性制度建设[J].经济学动态,2021(6):16-30.
- [9]石上松.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法和阶段[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5(2):1-8.
- [1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364;146;83.
- [11]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8.
- [12]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5;17.
- [13]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前线,2007(11):4-19.
- [1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34;143.
- [15]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1.
- [16]丁晓钦.“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改革理论与实践的逻辑统一——我国国有企业发展历程与展望[J].当代经济研究,2021(9):39-51.
- [17]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441;540-541.
- [18]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64-66.
- [19]周文,方茜.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意义[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2):16-22+107.
- [20]刘军.中国渐进式发展道路为什么获得成功[J].人民论坛,2018(31):20-22.
- [21]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70-71.
- [22]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把改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主攻方向 推动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方向发展[N].人民日报,2017-1-23(1).
- [23]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855.
- [24]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712.

[责任编辑:杨志辉,王丽爱]

The Course and Experience of Establishing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ZHUANG Shangwen, WANG Geng

(School of Economics,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5, China)

Abstract: Establishing market economy under socialism is one of our Party's pioneering moves. To build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led by the Party has generally gone through four stages: foundation and foreshadowing, exploration and initiation,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deepening and perfection. Theoretical cognition and breakthroughs in different stages are different in its own way. At the very beginning, both plan and market referred to the ways of resources allocation; currently, the market has played a decisive role in resources allocation and given a better play of government, which embodies our Party's constantly deepening cognition on the regularity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he fundamental experience of building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led by our Party can be summarized as: 1. Insist on the Party's strategic planning and unified leadership on economic work; 2. Promote emancipating minds, guide practice based on the developing Marxism; 3. Insist on “make a stand at every step”, implement incremental reform; 4. Excel in breakthrough at key points, strategically resolve major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5. Concentrate on incentive constraint, promote rational and orderly competition between local governments; 6. Center on people, adhere to the path of common prosperity.

Key Words: leadership of the CPC;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arket economy; resources allocation; common prosperity